

七 女 峰 阻 击 战

——国民党暂编第五师在华容的抗日史绩

· 刘 初 升 恭 甲 和 ·

七女峰，位于我县三封寺镇东北，四十五里桃花山南麓。海拔二百一十多米。就是这样一个即使在县级地图上也难找到的弹丸小山，却在华容人民的抗日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载。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日本侵略军第十一军四十师团侵占华容，并派山崎大队藤田一部占驻了华容东大门墨山铺。这样一来，沿岳阳——墨山铺——县城的交通县道，便成了日军的补给线和生命线。而雄踞在县城与墨山之间，离此补给线仅两千多米的七女峰，就象一颗钉子，钉在侵略者的命脉上。可是，日寇太狂妄了。他们没有把这个区区小山放在眼里，所以没有派一兵一卒去占领。机不可失！国民党暂编第五师的爱国将士们于是乘虚而入，他们出奇制胜，直扑山口，钱粮湖一线，派出一支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七女峰。暂五师的这一着有力地切断了侵占县城和墨山两路日军的联络和补给，无异于一双铁手扼住了敌人的咽喉。敌人坐卧不安，痛苦万分。于是，围绕七女峰，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就这样揭开了序幕。

一九四三年四月六日傍晚，日军藤田部约两百多人从七女峰东面发起进攻，据墨山、官堰、茅山、星火、柞树、毛家村一带的老

人回忆，当天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日寇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首先从墨山顶上向七女峰发动疯狂的炮击，炮弹把夜幕笼罩的天空都染红了。第二天，战斗更趋激烈，日军除了用大炮轰击外，步兵亦开始冲锋。战斗一直打了三天三夜没有停火。

驻守在七女峰制高点的是国民党督统第五师某营，担任阻击任务的是该营某连连长姓郝（名字已无法查看了）。战斗打到白热化的时候，其它连的官兵也上了火线。由于将士们的拼死战斗和居高临下的有利条件，给敌人造成了惨重的伤亡。据当地群众反映，战斗结束时，被击毙的日军共约两百多人。残忍的日军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把打死和重伤的兵士，都拖到山下的刘家花屋和罗家屯淋上汽油烧死，甚至连有些轻伤还能爬动的日军，也被活活地烧死了。

在三天三夜的激战中，我国军队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武器落后和缺乏后援，担任阻击任务的某连到四月九日晚上升后撤时，只剩下八十多人了。

这些爱国官兵们表现得多么勇敢，多么顽强啊！据随部队上山的向导、三天三夜激战的目睹者、现住官厅村大组的六十六岁老人殷文斌回忆说：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由于枪弹如雨，山下无法送水、送饭上山，全体官兵饿着肚子和敌人拼杀，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冲锋。这些勇士们人人奋不顾身，个个勇猛无畏，有的身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还不肯下火线，咬着牙，睁着眼，坚持战斗。那情景真是动人心弦，可歌可泣。以至在战斗结束后山下群众打扫战

场时，发现山顶来不及掩埋的烈士遗体，就有五十多具。死难烈士中，一名手持指挥小旗的军官，身中数弹，牺牲后仍然怒目圆睁，威武地挺立在战壕里。好几个战士牺牲后还站立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没有倒下去。有的手里还紧握着武器，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四月九日傍晚。日寇在受到重大创伤后，便从石首、监利方向调来两路援军数百人，从七女峰东、西、北组成三面包围，同时发起进攻。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据守在山顶的勇士们，才在夜幕的掩护下，顺着南坡，沿现在的陈家河、毛家渡，向钱粮湖方向撤退。为了掩护逃难的老百姓。撤退中，他们还追击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阻击。四月十日，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下午，日寇才带着惶恐的心情，战战兢兢地爬上了空无一人的峰顶。

为了发泄失败的怨忿，紧接着，这些输红了眼的兽兵，便对周围的居民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见男人便杀，见妇女便强奸，见房屋就放火。据调查，他们在这周围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杀害无辜群众共达三十多人，烧毁房屋达三十多栋，三百多间，杀死大耕牛达四十四条。被他们强奸的妇女和打伤、打残的人，则更是不计其数。更加残忍的是，日本强盗提到了一名在战斗中负伤来不及撤走的战士，这群恶魔竟将这位坚贞不屈的爱国者，绑在树上，

开膛破肚，活活塞死了。日本强盗犯下的这些滔天罪行，华容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七女峰一战，大长了中国军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事后，当这些杀人魔鬼回忆起这次战斗时，仍心惊胆颤，不寒而栗，摇头叹息。他们败得太惨。同时，也毫不掩饰地使出大捧捧称赞中国军队勇敢，原岳山县日伪维持会成员、现任三封寺村六十七岁的敖林阶，在与进攻七女峰的日军队长三本打交道时，就曾几次听这傢伙说过这样的话。

安息吧，七女峰壮烈牺牲的暂五师爱国将士们！

「附记：

刘初升，华容县三封寺镇干部，本会文史资料特约研究员。

蔡中和，原营钱粮湖农场干部，县政协常委，本会文史资料特约研究员。本文系据两人采访材料整理。」

一个抗日的民主参政机构

——石公华县临时参议会

· 严文田 ·

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以桃花山为中心的石（首）公（安）华（容）敌后抗日根据地。

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日，更好地在石公华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实行《鄂豫边区施政纲领》，石公华县委决定成立县临时参议会。

《鄂豫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政权而设立的。具有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双重性质的机构。凡各界人士，不论他们有无党派关系及属于何党何派，只要他们抗日并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都可以参加。

根据当时石公华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和任务，成立临时参议会，将党的政策向各阶层人民作宣传解释，消除中上层人士的怀疑恐惧，调动一切抗日的积极因素，使之积极参加石公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无疑是非常正确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九四四年八月，中共石公华县委、县行政委员会在华容大旺厂包家巷召开了石公华县各界代表会议，成立了县临时参议会。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国民党员等各方面的代表一百多人。会期原定半个月，因日寇捣乱，只开了七天。中途，

会址还秘密转移到了斋公桥，县委书记张泽生主持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经过民主协商，会议选举张泽生为临时参议会参议长，刘文斌为副参议长，蒋子辉为驻会秘书。会后不久，石首的徐国珍也以社会贤达的身分被补选为副参议长。被选为参议员的还有国民党员李向云、郭新民、王子衡，无党派绅士严东文、李作哉等三十余人。

石公华县临时参议会在成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召开各种会议，讨论财政预算、水利建设、税收政策、征兵支前、人事安排等，并相应地作出了各项决议，同时积极参加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各项抗日工作。临时参议会的一系列活动，使不少地主、士绅消除了对共产党、新四军的误解，调动了他们投身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其主要活动有：

1、创办民众茶社

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一九四四年八月底，临时参议会租借华容大旺厂李昌庆家的一间房子创办“民众茶社”，委任朱桐乡为社长。“茶社”除了第六联乡政府供给的一把茶壶和十多个茶碗外，其余家具、书籍如《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唐诗三百首》等，都是参议员、民主爱国人士捐献的。“茶社”开办不久，县行委会送来了大量的革命报纸书刊，如《新华日报》、《襄河日报》、《大众哲学》、《整风文献》、《毛泽东自传》、《论持久战》等。由于茶社办得有声有色，吸引了很多进步青年和民主人士，他们在茶社看报、下棋、喝茶、讨论新闻、时事，藉此

提高了对全民抗日的认识。茶社成了传播进步思想，动员全民抗战的重要宣传阵地。石葆生、李光宏、杨康、杨秋厚、刘子春等不少青年从这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毅然离开家乡，参加了新四军。

2、征纳田赋税收

临时参议会在校委的领导下，为粉碎敌人的经济掠夺与封锁，解决新四军五师和边区的给养，改善根据地军民的生活，紧密配合县行政委员会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贯彻合理负担的原则，征收田赋税（田赋），他们组织参议员参加抗日教育训练班，学习我党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了为夺取抗战的胜利而交纳田赋的积极性。参议员还分别到乡，配合各联乡办事处进行田赋登记，使田赋负担与实际占有土地相符。参议会田赋产，以产量税使税额与实际产量之比和规定的税率相当。土地被分为上中下三等九级（注：每等又分上中下三级），每亩分别征收谷物为一斗、六升、三升上下，并将征收办法由月征改为年征，取消随意摊派，税收走上正轨，使人民的负担得以减轻和趋于合理，因而群众踊跃交纳田赋。一九四四年秋，全县有土地三十余万亩，共交田赋一万五千多石。

3、发行建国公债

建国公债发行对象，主要是富商、地主、富农、士绅。一九四五年十月，临时参议会充分发挥参议员的作用，在各地发行建国公债，总额近一亿元之巨。新厂是石公华县的一个较大的商业集镇，有大、中商家十余户，参议员樊明珍召开各商家会议，（下转第10页）

谢齐家先生在家乡轶事

· 刘味诗 ·

谢齐家先生，华容县鲇鱼须人，小时从塾师郭粉斋先生读书。一九二二年入县城天主堂望德高小肄业一年期，后求学长沙。一九二四年投奔广州参加革命，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北伐时，历任排、连、营长、副团长等职。解放前在河南胡宗南部任兵站总监，第七补给区少将参谋长。全国解放前夕去台湾，历任台湾北部防守区司令部参谋长，台东地区警备司令，国防会议战地委员会筹备处第一组主任，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现年八十二岁。

谢齐家先生出身农村，旧学造诣很深。从军后，对华容豪劣勾结官府，欺压人民，深恶痛绝，拟以华容在外军校同学的力量，派人回县取得县有武装的领导权，进而改革华容的局面。通过在外地的同学磋商，一致认为改革县政，造福桑梓，也是革命军人应有的责任。于是，便在一九二九年春推派黄埔第四期同学罗贵环、张伯骏等人回县为谢齐家组票竞选。在与各公法团和各区负责人斡旋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同情与赞许。此时与他竞争的对手是东山张维，有眠犬张氏之称。华容的大族青湖张姓便竭力为之撑场，并买通湖南省政府派来重要人物刘岳厚充当张的后台。

是年七月份由华容县长朱德龙召开选举大会。开票选举，结果张维落选，谢齐家先生得票最多，当选为华容县挨户团防局副主任。

(正主任由县长兼，只挂名)。

华容县挨户团防局原有建制辖四个中队，一个特务排，一个中队相当于一个步兵连，共约一个营的兵力。谢先生接任后，将建制扩编为一个团，向湖南省保安司令部申请购买了枪枝补充。其原有四个中队合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另外增设一个大刀大队，共三个大队。除保留了特务排外，增加了一个电话排。所有大、中队长等主事干部，均选用军校毕业生。如杨经纶、孙国基等为大队长；陈钊、黄作文、周德厚、谭敬安、严治华、王书乐、谢浩气等为中队长。杨经纶还兼理全局训练教育，为副主任的助手。

县设置枪械委员会，负责供应团防局的枪械装备。该委员会由委员五人组成，互选王怒为主任。王系注市镇人，为豪绅张丙炎（愚堂）的外侄，少年气盛，跋扈飞扬，路人多为侧目。

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贺龙元帅由洪湖起兵攻克华容、南县，谢齐家先生率部撤退至北景港、注淤口，转驻南山罗家咀。时已入冬，天寒地冻，士兵缺衣少食。谢先生向王怒索饷，王控制不予，并企图携款溜走。谢处此境地，遂将王捆绑扣押。王以为自己势力雄厚，认为谢齐家莫奈他何，故仍然坚持不予。谢先生回县工作原抱着改革县政，造福桑梓的目的，想不到自己竟碰上了豪劣恶势力的挑战，愤慨之下，就把王怒枪毙了。消息传到注市，张丙炎等一伙即奔赴长沙告状，并以巨金贿赂，省府竟允其所请，将谢齐家先生撤职查办。谢不得已，只好弃职逃往武汉躲避，以后便转入正规

勤工作。

谢先生在华容为时不长，对家乡人民虽无重大建树，但杀了一个王惠，为当时华容人民除了一个“地头蛇”，使一班在地方称王称霸的豪劣有所敛迹，亦大快人心事也。往事已五十多年了，然而，家乡的人每谈及此，仍无不对谢公的这种精神备加赞颂。现在谢公远适海外，青年时期他那种关心桑梓，热爱家乡之情，如今想必更甚。惟惜海峡隔阻，无从邀致尚为憾耳！

（上接第7页）

积极推销建厂公债。樊明珍等两个参议员首先各认购五百万元，其他商家见此，均一一认购，这样，新厂一次即认购了建厂公债三千余万元。此外，其他各地的参议员也广泛动员各界人士并带头认购，所以很快超额完成了边区政府分配的发行建厂公债的任务，为边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附记：

严文田，中共华容县委党史办公室干部。我会文史资料特约研究员。本文系根据有关材料整理而成。」

忆 次 梅

·谭荣铎·

今年十月三日是曾惇同志逝世周年忌辰。曾惇，字次梅，一九一九年出生于南县城关镇，原籍邵阳，毕业于岳祁联师，曾任南县小学教员、民众教育馆馆员和报社编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南华工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南县中心县委书记、公南特委书记，下川东特委书记及武汉市委书记。解放后，初任武汉市委组织部长，继任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十年浩劫时被打成黑帮，身心遭受摧残。拨乱反正后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因长期卧病，不幸逝世。

惊悉他病逝的消息，我悲痛极了。虽说解放这许多年我们已没有什么交往，但过去彼此间的友情却是难忘的。解放初期我在西南军大学习时，他曾向组织上写信，证明我在抗战期间为党做过的一些工作。其实在我知道后，只是徒增了我的愧疚。五二年底我被从西南遣返回乡，虽然我们在政治上已有天壤之别，但我仍企望有朝一日还会和他把手畅叙离情的。想不到这屈指可期的日子竟不可待，他却先我而辞别了人间。

记得我们的认识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正当抗战初期，我在南县筹办《怒号旬刊》时。当时曾惇在南县《先声》报社任编辑。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官正街“镜中影”照相馆楼上。秋天，我们都穿着灰竹布长衫，他中等个儿，面容清瘦，两眼却炯炯有神，谈

话慢时有些微口吃。

不久，李服波同志从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回南县组建南华工委。因服波在大革命时和我叔父谭旷和堂兄谭经是亲密战友。大革命失败后，李在沅江被捕，后转押南县监狱。我曾几次同友人去监狱探望他。出狱后，朋友们设宴为他洗尘，恰巧我和次梅都在座。以后，次梅由服波口中进一步了解到了我和我家庭的一些情况，我们的往来就更加密切了。

次年，我任教的北岳小学（北小与南县一河之隔，相距只十五华里），延聘了曾博来景港任教。在任教，我们一同组织了学生晨呼队、歌咏队；并在气、乡组织青年救国队，青年救国队，进行抗日宣传，支援前线。这样，我们就游而成了朋友。

从此，我便经常和次梅一道去南县，而且每次必去他家，他妈妈很好客，每次都热情地接待我们。家中有几菜，也总要给我们留着。曾妈妈过早地为次梅收了童养媳——一个不多言笑，勤劳老实的女孩子。但次梅不同意这门亲事。为此，曾妈妈很伤心，常背着次梅要我劝劝他。有时我也同次梅谈过这事，他只是笑笑而已。后来他们毕竟分手了，是在我离开家乡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

暑假，次梅回南县专任中共南华工委书记并主编《先声》作为工委机关报。这时，恰好我应南县永安印刷公司经理任怀业创办的前县《农友报》之聘担任编辑，即住在“永安”。因业务不忙，空余时常和次梅在一起，并帮忙为《先声》写些东西。一天晚上，我们

同在朋友孙学文家纳凉，听到他父亲新开张的大长安印务馆印务吃不饱，我便提议由我们亲办一个晚报，由次梅和我负编辑责任，由学文负责印刷和发行责任。一谈大家都很同意，这就是南县《工余晚报》的创刊经过。这个报每天发行八开一张，因内容丰富、文字短小精炼，颇受群众喜爱。不久，这报便由南县以心县委接办了。

夏夜的南县河滨，露天茶馆林立，一张睡椅，一杯清茶，随意的点心，迎着清凉的河风，的确是个纳凉胜地。记得有天晚上，次梅约我和张轶材⁽²⁾在河边纳凉喝茶，我们天南地北地谈着，谈到如何坚持抗战，以及如何巩固国共两党合作等问题，一直到转钟。夜市收了，我们三人就谈兴未尽，便沿着河岸，绕着环城大路，边谈边走，待行至西城门口时，已不知“东方之既白”矣。

“七·七”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一直有着去圣地延安的愿望，曾几次向服波和次梅诉说过。我有一位朋友周琪，系长沙湖南公医院护士，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曾多次来信和我商量，要去延安。得周的信后，我曾几次向次梅介绍了她的情况。

这以后便到了三九年的夏天。记得是六月六日——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的朋友服波和热表妹李秀英一道从长沙来到了南县，捎信要和我商谈去延安的事。晤谈之后，我即带她们同去《先声》报社，向次梅作了介绍，并告诉了我们决心上延安的打算。次梅听了十分高兴，表示一定尽力帮助我们。经过两天的准备，在次梅的精心策划下，我避开学校和家庭的阻拦，悄悄躲进南县一家信

僻的小客栈里。第四天清早，我们三人即由南县河边上船去藕池，以后便沿着他安排的路线，由公安、沙市、宜昌，经三峡直抵重庆。计划到重庆后，再持他的介绍信去《新华日报》社找吴克坚总编辑，然后请吴设法送我们去延安。人生自古伤离别，我最清楚地记得那天清晨，南县河边上船之际，次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复叮咛：“路上小心谨慎，一路平安！……”船开了许久，遥望岸上，似还站着他那单瘦的身影……

这些就是我和次梅过去的友情。回忆起来已是四十六年前的事了，在他的关心与帮助下，本来我可以走上革命的道路，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的，可是，我对不起他，也对不起一些关心我的朋友。当我们三人抵达重庆以后，由于日寇对重庆的疯狂轰炸，好不容易才在化龙桥的《新华日报》社见到了吴克坚同志，但他暂时又无法解决我们去延安的交通工具。住着、住着，我们所有的盘缠用光了，为了生活，周琪和秀英找到了一位亲戚家去住，我也恰好遇到了一位在军队里姓曾的朋友。当时我曾连续将情况写信告诉次梅，并请他为我们拿拿主意，可是，始终得不到回音。后来才从她的一封信中知道，当我们离开南县后不久，南县县心县令便被叛徒出卖，南、华两地牺牲了许多同志，曾博业已出走，并被通缉了。

彷徨在重庆街头，加着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一时，在受军人同乡的熏染下，我为了个人“出路”而忘记了革命。在我命路上半途而废了。到后来，与周琪们也失去了联系。从此，我便走上了以

后十年可悲的道路。

次梅，今天我回忆这些往事来悼念你，你知否我多年来对你的内疚和忏悔？你能宽恕我吗？

〔附记：谭荣铎，字沂清，现年七十岁。华容人。抗战前任小学教员，抗战后考入黄埔军校十七期及军校高等师范班十期毕业，曾在原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和高等军校等部门工作，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成都随部起义，五二年底回家乡，八〇年退休。〕

注：

(1)李服波，南县人。系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多年遭反动派关押，坚贞不屈。抗战初，由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营救出狱。一九三七年十月组建南华工委任书记。后调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工作。闻不久在沅江被反动派杀害。

(2)张轶才，安徽人，本姓阚。系南县党的著名活动家周铁姐的爱人。解放后，铁姐去了北京，张在南县法院工作，并曾当选为县人大代表。现已逝世。

《难忘的历程》之五

离 开 抗 大 以 后

· 罗 志 雄 ·

编者按：到本期为止，罗志雄同志的《难忘的历程》全文业已载完，希读者联系前文阅读，并提出宝贵意见。

欢送抗大总校同学去华北后，延安只有抗大第三分校了，我在这里继续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边区政法干部训练班教育长朱墨同志向校部写信，希望能把我分派往南方新四军去工作。不久，一位秘书同志找我谈了话，同意我去南方工作，要我作好准备。

九月十五日我拿着抗大的介绍信去八路军总部，总部给我发了护照回湖南。谁知十八日抵洛川时，却被一面制造磨擦，破坏抗战的国民党反动派扣留了。两天后，并将我们解送到了“咸阳西北青年劳动营”。

劳动营的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特别训练总队”，房子是占用咸阳打包厂的，这便是胡宗南控制的国民党设在西北的集中营。总队长肖作霖，湖南人（四九年在湖南省保安司令，随程潜主席在长沙起义。），今年在报上一条黄埔同学会成立的消息上，我还看到了他的名字。

集中营分两个大队，四个中队。关押着共约两百多人，大都是八路军的干部、战士，以及思想进步被认为有“共党”嫌疑的青年学生和工人。

我编在二大队六中队（其实并无六个队），全队五十余人，中队长彭古农，湖南衡阳人，宪兵学校毕业。政治队附是个特务，每晚都找人谈话，要我们说出自己的身份和在延安认识的人，在国统区有关系的人。只要我们能说出一个共产党员，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

为了逼迫我们就范，敌人首先要从思想上麻醉我们。他们强迫我们每天学习上课，对我们讲授所谓《总理遗教》、《总裁言行》、《王阳明学说》，以及由托派分子丁莲白讲《社会发展史》来毒害我们的思想。国民党军委政治部还派邓文仪和蒋经纶（蒋介石的侄儿）来讲过话。

有一次，队上叫我写一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哪个好？》的墙报稿子。我写的大意是：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是不同的，我们拥护奉行三大政策的真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的不是对立的，并不存在哪个好哪个坏的问题。

由于这篇文章，政治队附便恼羞成怒，先是大骂我“顽固”，继而罚我从深夜跪到早上五点。这以后还经常给我下小操、打耳光、抽皮鞭……最后把我关了禁闭。

为了逼出我的供词，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便派二中队队长王